

# 历史唯物主义与“经济决定论”关系考辨

林锋，闫添

(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100871)

**摘要：**学界流行的看法是将“经济决定论”视为与历史唯物主义根本对立的思维倾向，反对用“经济决定论”来描述历史唯物主义的学术立场。但是反复辨认、推敲马克思、恩格斯文本中的相关论述可知，他们从未将自己的历史唯物主义学说与“经济决定论”简单对立，更未反对和拒斥唯物史观意义上的“经济决定论”。他们反对的是单纯、过度、片面地强调经济因素的决定作用，将此种“决定作用”不分场合、不分领域、以某种夸张方式予以强调的那种违反历史辩证法、带有机械论色彩的“经济决定论”。马克思、恩格斯的诸多论述充分表明，他们是特定意义上的“经济决定论者”。马克思、恩格斯共同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在强调经济因素“归根到底”决定人类社会基本面貌和人类历史总体进程、经济基础“归根到底”决定政治的以及观念的上层建筑这两方面可归类为某种意义上的“经济决定论”。必须特别声明的是，将“经济的决定作用”从他们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体系中剥离，拒绝赋予马克思、恩格斯学说以“经济决定论”称谓，与之截然对立，意味着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误解，并导致后者的核心立场无从体现，从而使历史唯物主义不成其为“历史唯物主义”。澄清“经济决定论”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真实关系，恢复“经济决定论”在历史唯物主义中的应有地位，有助于深刻理解其核心观点、根本立场，彰显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特质、理论品格及应有的思维方式。

**关键词：**马克思；恩格斯；经济决定论；历史唯物主义

中图分类号：B03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04(2025)06-0044-011

## 一、“经济决定论”：一种被简单否定的历史唯物主义解读模式

“经济决定论”是一种在国内外学界引发了较大争议的历史唯物主义解读模式。如何看待它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真实关系？学界的说法不尽一致。部分学者认为“经济决定论”揭示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真义，主张用“经济决定论”描述历史唯物主义经典立场；更多的学者认为“经济决定论”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严重误读和庸俗化解读，应坚决拒斥，将其与历史唯物主义严格区分开来。总体而言，在学界占据优势地位的做法是将“经济决定论”直接认定为消极术语，将其视为一种与历史唯物主义直接对立的错误观点。强调“经济决定论”与历史唯物主义内在一致的学者，其见解在学界中不占优势。

值得一提的是，支持上述流行看法的不少学者，一提到“经济决定论”，往往不假思索地认为它是违反马克思、恩格斯辩证法的庸俗观点，是一种只谈“经济”的决定作用、无视非经济因素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的简单的机械论观点。这种观点在国内学界的流行，较大程度上是基于保卫马克思主义的需要。的确，国内外学界中不乏用“经济决定论”来攻击、否定马克思主义的论者。

收稿日期：2025-06-13；修回日期：2025-09-16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数字经济时代的全球化问题研究”(24FBSB036)

作者简介：林锋，男，福建福清人，哲学博士，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及思想，联系邮箱：lin2073@163.com；闫添，男，内蒙古呼和浩特人，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及思想

“经济决定论”往往被视为历史唯物主义存在“理论缺陷”的一个“确凿”的证据。传统倾向的马克思主义学者为了应对论敌的挑战，捍卫马克思主义应有的学术声誉、学术地位，澄清被论敌所歪曲的学术真相，的确有必要作出强有力的回应，驳斥论敌的错误立场。这在情理之中，是可以理解的。但值得反思的是，不少学者在应对论敌的挑战时，往往在无意识状态下，在相当程度上，被论敌的尖锐言辞和貌似有力的论证所迷惑，被引入思维误区，虽然在基本结论上反对对手并维护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地位，但是在未作深刻辨析、未全面认识相关学理问题的情形下默认了对手的某种结论。这就导致他们与论敌对某些重要问题的见解都失之偏颇，其中对“经济决定论”的简单否定就是典型例证。这些学者维护历史唯物主义，这是值得肯定的。但令人遗憾的是，他们几乎无差别地认同论敌对“经济决定论”的简单评价和定性。我们在考察“国内外马克思主义学界如何回应论敌对马克思主义科学地位的挑战”时，经常发现“经济决定论”遭受了未经充分的学理探讨便遭简单抛弃和声讨的命运。人们往往在不假思索的情形下，先入为主地对“经济决定论”直接予以拒斥与否定。将“经济决定论”与历史唯物主义严格区分开来，几乎成了马克思主义学界一致的呼吁。急于与“经济决定论”脱钩，以认证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身份，成了这些论者一致的思维方式。

我们主张，在对“经济决定论”的是非曲直作出判断前，应深入思考以下几个问题：被许多学者不假思索直接否定、貌似“庸俗观点”的“经济决定论”是否必然、天然地带有“消极”色彩？是否必须视作所谓的“贬义词”和“消极术语”予以拒斥？还需进一步追问：是否存在不同意义、不同色彩的“经济决定论”，以至于不能全盘否定“经济决定论”，而必须对它本身进行分类讨论、分类评价？

仔细考察“经济决定论”产生及演变的历史，有助于对“经济决定论”本身的是非曲直作出全面、客观的判断。我们发现，实际上存在着不同类型、体现不同思维方式与学术立场的“经济决定论”。具体地说，至少可区分出四种不同的“经济决定论”，即机械决定论色彩的“经济决定论”、辩证的“经济决定论”、“多元的”和折中的“经济决定论”、经济学意义上的“经济决定论”。第一种“经济决定论”，即带有机械决定论色彩的、庸俗的“经济决定论”，应从历史唯物主义立场和思维方式出发坚决予以纠正。第二种“经济决定论”其实是马克思、恩格斯所主张的“经济决定论”（尽管不少论者尚未意识到这一点），此种“经济决定论”强调经济因素在人类历史中“归根到底”意义上的决定作用，对此不能视为拒斥的对象予以否定，而应看到它与历史唯物主义立场的一致性，予以肯定。第三种“经济决定论”带有“多元的”和折中的色彩，与马克思主义所主张的“经济决定论”有重要区别，虽然它不主张机械套用“经济决定论”，但是未能正确认识经济因素和其他因素的关系，应指出其缺陷，同样予以纠正和超越。第四种“经济决定论”从特定视角强调了经济因素的决定作用，有一定的科学价值，尤其是英国经济学家阿尔弗雷德·马歇尔注意到经济因素对人类生活及历史运动的深刻影响，这是难能可贵的，一定程度上与马克思、恩格斯“经济决定论”相契合。但总体而言，此类“经济决定论”偏重物质利益、财富因素对人性的制约和决定，未对经济因素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终极动力的根本地位作出充分肯定，且其“经济人”假定等教条是否可信尚待进一步推敲。

本文依照循序渐进的思路，首先考察“经济决定论”的四种类型，进行分类探讨，以此向读者表明“经济决定论”本身的多样性，引导读者走出“‘经济决定论’仅有单一类型”的思维误区，为后续探讨作出必要铺垫；随后以大量篇幅，重点辨析和澄清历史唯物主义与“经济决定论”的关系，依据强有力的文本学证据，论证“马克思、恩格斯的历史唯物主义在特定意义上是‘经济决定论’”的结论，为特定意义上的即符合历史唯物主义思维方式、精神实质的“经济决定论”正名。在我们看来，恢复“经济决定论”在历史唯物主义中的应有地位具有重大意义。“经济决定论”被视为消极术语，长期以来被学界不少论者拒斥，这是一种虽有特定原因但终究难以自圆其说的做法，对此应重新评估其合理性和可信度，确立更可靠、更符合学术问题真相的见解。

## 二、对四种“经济决定论”的依次考察

### (一) 机械的“经济决定论”

19世纪90年代，以莱比锡大学教授巴尔特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学者大肆宣扬唯心主义，对历史唯物主义展开攻击。他们用“经济唯物主义”“机械决定论”等概念描述历史唯物主义，把历史唯物主义歪曲成只讲经济对社会历史的决定作用，全然不顾思想观念、政治上层建筑的反作用的庸俗的机械论学说。他们虽没有明确使用“经济决定论”一词，但是使用了和它含义相近的“经济唯物主义”“机械决定论”等词，以此否定和攻击历史唯物主义。这就是马克思主义论敌视域中的、被其视为历史唯物主义所谓缺陷的“经济决定论”。这种“经济决定论”的内涵基本等同于“唯经济决定论”，即只肯定经济对社会历史的决定作用，忽视其他因素的相对独立性和反作用。值得注意的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支持者中，同样存在着类似把“经济决定论”视为庸俗强调经济因素无所不在地发挥决定作用的机械论观点的倾向。他们虽然一致赞同历史唯物主义，但一致反对他们认定的上述庸俗的“经济决定论”，并试图从学理高度论证这种“经济决定论”的谬误性及其与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区别。

1890年前后，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形成了一种小资产阶级半无政府主义流派——“青年派”。“青年派”以马克思主义的信奉者与捍卫者自居。但恩格斯批评他们“对他们宣称要加以维护的那个世界观完全理解错了”<sup>[1](85)</sup>，并指出他们在理论与策略上的谬误。恩格斯称它是比小资产阶级党团“危险得多”的集团，在1890年6月至10月间写了多封书信，揭露、批判其危害与谬误。“青年派”机械地将唯物史观理解为某种“公式”和“套语”，并以主观、人为的方式裁剪历史事实、贴标签式地“解决”问题。“青年派”臆造的“公式”和“套语”，片面地、夸张地描述了经济因素在人类历史中的决定作用。恩格斯批判“青年派”领袖保·恩斯特：“直截了当地重复他从形而上学者杜林那里学来的荒谬论断，说什么在马克思那里历史是没有(正是创造历史的)人的参与而全自动地演进的，人完全像棋子一样受经济关系(而它们本身就是人创造的！)的摆布。”<sup>[1](102)</sup>恩斯特就这样机械地割裂了“经济关系”与“人”的联系，把“经济关系”当作专断、任性的“棋手”，把“人”当作受“棋手”随意支配的“棋子”。他先入为主、不分场合地把“经济关系”简单、机械地置于“人”的操纵者与决定者之地位，“对于在每一特定时刻起决定作用的历史事实一无所知”<sup>[1](85)</sup>。恩格斯批评“青年派”抱有偏见、先入为主地考察经济与政治的实际情况，“在判断经济和政治形势时不能毫无偏见地权衡现存各种事实的轻重和参与斗争的各种力量的强弱”<sup>[1](103)</sup>，也就是对经济因素与其他因素的关系及作用不能作出合理考量、正确评价。值得注意的是，与(上文提到的)论敌和马克思主义某些辩护者共同反对机械决定论色彩的“经济决定论”不同，以恩斯特为代表的德国“青年派”却积极应用这种“经济决定论”，是这种庸俗观点的最大代表。

### (二) 辩证的“经济决定论”

作为上一种观点的直接对立面，法国马克思主义者保尔·拉法格第一次明确地从正面意义上使用了“经济决定论”一词：“经济决定论，这是马克思交给社会主义者的新的工具，为的是要靠它的帮助把秩序带进历史事件的混沌状态中去。”<sup>[2](7)</sup>拉法格旗帜鲜明地肯定了经济因素对社会历史发展的终极决定作用，指出经济因素尤其是生产方式是社会生活中最活跃的、最经常变动的、带动整个社会结构发生变动的因素，并且经济因素还通过直接或间接地吸引社会大部分成员的“精力”而具有最广泛的影响<sup>①</sup>。拉法格反对机械地理解生产方式与其他因素的关系，强调“生产方式决不会以数学般的精确性在一切靠它生活的民族中产生出同样形式的人为环境或社会环境”<sup>[2](37)</sup>，不能机械地理解经济因素的决定作用。这就使得他与机械的“经济决定论”划清了界限。

与拉法格一道反对唯心主义的还有梅林、拉布里奥拉等人。他们都赞同恩格斯的观点，认为历史唯物主义强调经济因素在“归根到底”的意义上对社会历史发展起决定作用，同时肯定其他因素对历史发展的重要作用，反对把经济因素的“决定作用”简单化和庸俗化。他们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可称为辩证的“经济决定论”。

辩证的“经济决定论”的最大代表无疑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马克思、恩格斯是这种“经济决定论”的理论奠基者。不同于教条式地宣扬经济决定作用的那种“经济决定论”，马克思、恩格斯并不认为经济因素对人类社会的微观领域及人类历史运动的任何细节、任何具体的历史事件都直接起决定作用。他们的“经济决定论”强调的是经济因素对人类社会及人类历史“归根到底”意义上的决定作用。也就是说，他们是在特定意义上而不是在任何意义上讲经济的“决定”作用的，“特定意义”即这样的意义：“归根到底”。“归根到底的决定作用”，即从根本上所起的那种决定作用。此外，起这种“归根到底”的决定作用的经济因素，是特定的和唯一的经济因素，即物质生产，而不是任意的或所有的经济因素。在他们的“经济决定论”中，关键词除了“决定”，还有“归根到底”，前者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语境中说的是“主导”或“支配”，即经济因素对人类社会和人类历史的主导或支配。更具体地说就是，它对人类社会基本面貌的支配及对人类历史总的进程的主导，以必然性的方式规定了“人类社会的基本面貌处于何种状态”，以及“人类历史的进程处于何种阶段”。“决定”是与“必然性”直接关联在一起的概念，意味着结果和状态的“确定性”和“唯一性”。具体地说，在人类特定历史时代，经济因素即物质生产的具体状况和水平导致了人类社会当时的基本面貌具有确定性和唯一性，后者处于被经济因素具体规定的特定状态中，人类历史当时所处的具体阶段也因物质生产的具体状况和水平而具有了确定性和唯一性。后者科学地认定了经济起决定作用的主要方式，把那种不恰当的即把经济的决定作用无条件推广到社会历史一切场合中的庸俗的“经济决定论”(从对历史的正确理解中)排除出去，从而给予了“经济决定论”恰如其分的施展空间、运用场域。在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见解中，“经济决定论”与历史唯物主义毫不矛盾，甚至完美统一。强调经济因素“归根到底”的决定作用的、处于特定语境中的“经济决定论”与高度重视非经济因素在人类社会及历史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的历史唯物主义固有观点不是分裂的，而是构成一个和谐的理论整体。二者同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应有之义，对于历史唯物主义而言都是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 (三) “多元的”和折中的“经济决定论”

德国修正主义者爱德华·伯恩施坦也主张把历史唯物主义解读成某种意义上的“经济决定论”，认为“经济决定论”能准确展示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思想与基本观点<sup>②</sup>。值得注意的是，伯恩施坦在阐述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思想时，始终认为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物质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即生活资料的生产方法和生活资料生产的自然条件”这些经济因素，是人类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甚至是“最终决定性因素”。像巴尔特一样，伯恩施坦没有直接使用“经济决定论”这一术语。但是他把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思想解读为“经济因素在人类历史过程中起决定作用”，表明他赞同把历史唯物主义解读为某种意义上的“经济决定论”。

值得注意的是，伯恩施坦本人对“经济因素在人类历史过程中起决定作用”的观点并未一概赞同和全盘接受，而是对它有所保留。他认为：“我们今天所见到的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形态，和它的创始人起初赋予它的形态是不同的。它在创始人自己那里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在创始人自己那里，它的独断主义的解释也受到了一些限制。”<sup>③</sup>实际上，伯恩施坦把马克思、恩格斯有关“经济因素起决定作用”的论述区分为两种“形态”，即“最初的形态”和“成熟的形态”，认为它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经历了由前者到后者的发展过程。伯恩施坦认为，“最初的形态”对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和《资本论》“第一卷序言”中的表述，在这些表述中马克思以“独断的措辞”和“带有宿命论音调的句子”阐发了经济的决定作用；“成熟的形态”对应恩格斯《反杜林论》和晚年书信(1890年写给约

瑟夫·布洛赫的信、1890年写给康拉德·施密特的信、1894年写给瓦尔特·博尔吉乌斯的信)中的论述,恩格斯在这些文本中“限制”了经济因素的决定作用,承认了非经济因素的“自在运动”及其对人类历史过程的影响。伯恩施坦不满意上述“最初的形态”,认为马克思在相关文本中对“经济因素起决定作用”的叙述方式具有夸大性和片面性。相反,他认同“成熟的形态”,认为恩格斯的补充与论证提高了“理论的科学性”。伯恩施坦实际认同的就是他从恩格斯上述文本中解读出来的特定意义的“经济决定论”。

伯恩施坦认可的“成熟形态的经济决定论”在肯定“经济因素在人类历史过程中起决定作用”的同时,强调了思想意识等非经济因素在人类历史过程中的重要性及其对人类历史过程的重大影响。这和马克思、恩格斯的相关观点并不完全矛盾。但是,问题的关键在于,当在理论上提高非经济因素对人类历史的重要性与影响程度时,如何界定其“影响”的性质、程度与范围?如何处理其与经济因素的关系?在这一问题上,必须澄清的是,马克思、恩格斯从未将“经济因素”与“非经济因素”等量齐观,从未在“人类历史发展根本动力”问题上陷入“二元论”或“多元论”,而是在前期和后期相关著作中一以贯之地强调:“归根到底”起决定作用的因素只是经济因素。相反,伯恩施坦在抬高非经济因素的历史作用与影响的同时,忽视甚至取消了经济因素“归根到底”对人类历史过程起决定作用的观点,忽视甚至否认经济因素相比其他因素对人类历史进程的特殊的、根本的重要性,陷入了“多元论”或折中主义的解读<sup>③</sup>。

伯恩施坦的“多元论”或折中主义倾向被第二国际修正主义和俄国经济派进一步强化,变成对人类历史运动的折中的和“多元论”的解读模式。这种解读模式虽然承认经济因素的决定作用,但把经济因素、非经济因素的决定作用等量齐观、不分主次,结果使经济因素对人类历史“归根到底”的决定作用变得不突出,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这种“归根到底”的决定作用被抹杀了。值得注意的是,在伯恩施坦那里,在对人类历史进行解读时,首要的、中心的因素即物质生产因素被淡化了。这种解读模式的主要弊端是未能正确把握经济因素和思想意识诸因素之间的真正关系。这一解读模式与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原意不符,也和拉法格的解读存在本质区别,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产生了消极影响,必须单独区分出来进行批判性考察。

#### (四) 经济学意义上的“经济决定论”

现代经济学对“经济因素的作用及影响”的考察与论述,往往被某些学者解读为特定意义的“经济决定论”。亚当·斯密之后,经济学中广泛流行着“经济人”(或称“理性经济人”)假设,即把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当作人的决策与行动的根本动机,把经济利益考量视作人的行为的决定性因素。美国经济学家格里高利·曼昆在其畅销教材《经济学原理》中指出,“经济学家研究人们如何做出决策”<sup>[4](3)</sup>,并认为“理性人通过比较边际成本与边际收益做出决策;人们根据他们所面临的激励改变自己的行为”<sup>[4](18)</sup>。人的决策可被解析、转化为经济考量,从侧面印证了经济因素的某种“决定性”作用。不仅人的决策,人的性格也被一些经济学家认为由经济因素决定。英国经济学家阿尔弗雷德·马歇尔在其名著《经济学原理》一书中,认为“人的性格是由他的日常工作,以及由此而获得的物质资源所形成的,任何其他影响,除了他的宗教理想的影响外,都不能形成他的性格。世界历史的两大构成力量,就是宗教和经济的力量……宗教的动机比经济的动机更为强烈,但是它的直接作用,却不像经济动机那样普遍地影响人类生活”<sup>[5]</sup>。经济因素被马歇尔描述为世界历史的“两大构成力量”之一,它对历史的作用体现为对人的生活与性格的影响。上述“经济因素对人的决策、性格、生活具有决定性影响”的观点广为流传,已超出一般经济学的范围,成为在社会上流行的对“经济决定论”的某种理解。

不难看出,“经济决定论”的具体情形较为复杂,类型是多样化的。在对待“经济决定论”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关系问题时不能仓促判断,不能简单否定所有类型、所有意义上的“经济决定论”。

我们认为,在对“经济决定论”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关系作出明确判断前,应反复辨认、精确推敲

马克思、恩格斯本人的论述，特别是审慎地思考、推敲以下问题：首先，马克思、恩格斯是否明确批判和反对过“经济决定论”，是否拒斥和反对任何意义上的“经济决定论”？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么一概否定“经济决定论”这个提法或倾向，将其与历史唯物主义割裂开来，是否有充足的理由呢？其次，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中是否蕴含着某种意义上的“经济决定论”？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立场与“经济决定论”究竟是什么关系？一旦否定“经济因素‘归根到底’决定人类历史”这一唯物史观经典立场，唯物史观是否还成其为“唯物史观”？严肃思考这些问题，将引导我们把握学术问题的真相，稳健地作出判断，避免走入思维误区。对此，我们的结论是：马克思、恩格斯的历史唯物主义经典立场和“经济决定论”并不矛盾，历史唯物主义应视作某种特定意义上的“经济决定论”。当然，我们不认为“经济决定论”是唯物史观的全部，它只是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一部分，仅从“经济决定论”出发来概括唯物史观是不全面的。只有把“经济决定论”与唯物史观的其他原理高度统一、有机联系起来，才能有效把握唯物史观的整体面貌，深刻理解人类历史运动及其运行规律。

### 三、历史唯物主义与“经济决定论”的关系

#### (一) 马克思、恩格斯是否反对或否定一切类型的“经济决定论”

从现有的文本学证据来看，马克思、恩格斯根本没有使用过“经济决定论”一词，更没有对“经济决定论”作出直接评价或系统批判。追溯“经济决定论”产生和演变的历史也可看出，“经济决定论”术语首次出现于拉法格 20 世纪初出版的《思想起源论：卡尔·马克思的经济决定论》一书中，彼时马克思、恩格斯都已过世。认为马克思、恩格斯明确批判了“经济决定论”，其实是一种与现有证据不符的主观说法。这种说法往往是某些学者基于对“经济决定论”先入为主的成见，把所谓“马克思、恩格斯拒斥‘经济决定论’”的说法强加给马克思、恩格斯。

值得注意的是，国内一些学者把恩格斯晚年书信中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论述看作恩格斯反对“经济决定论”的所谓证据。有学者援引恩格斯 1890 年 9 月 21 日写给布洛赫的信作为“证据”，认为恩格斯用“历史合力论”明确否定了“经济决定论”，并把恩格斯对教条主义者所说的语重心长的话（“青年们有时过分看重经济方面，这有一部分是马克思和我应当负责的。我们在反驳我们的论敌时，常常不得不强调被他们否认的主要原则，并且不是始终都有时间、地点和机会来给其他参与相互作用的因素以应有的重视”）视作恩格斯反对“经济决定论”的“证据”<sup>[6]</sup>。实际上，恩格斯在这封著名书信中反对的是一种特定意义上的“经济决定论”，而不是否定一切意义、所有类型的“经济决定论”。在文中，他甚至没有直接使用“经济决定论”这个概念，更谈不上对这种所谓的“消极倾向”进行否定性评价。就思想内容而言，恩格斯反对的不过是一种机械、庸俗的“经济决定论”，即不分具体场合与实际情况、机械强调经济因素决定作用的那种消极色彩的“经济决定论”。

从此信中不难看出，恩格斯在 19 世纪 90 年代面对着一种教条化对待历史唯物主义的倾向，即把历史唯物主义解读为一种不分具体场合、到处强调经济因素无所不在的决定作用的机械的“经济决定论”。这种解读模式把经济因素视作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唯一决定因素，忽视政治、观念等其他因素的相对独立性和反作用，以及在特定领域、特定场合、特定历史事件中非经济因素某种程度上的决定作用。恩格斯在晚年书信中所反对的正是这样一种明显违反历史辩证法的机械的“经济决定论”。他有针对性地澄清：“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sup>[7](591)</sup>在此，恩格斯反对把经济因素看作人类社会及历史发展过程中“唯一决定性的因素”，也就是坚决反对机械论色

彩的、庸俗的“经济决定论”——只讲经济因素的作用，不谈非经济因素历史作用的错误倾向。这里顺便澄清一下，恩格斯反对“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是有特定所指的，绝不是认定非经济因素与经济因素同为人类历史进程的主导因素、终极决定者，而是说决定人类历史运动细节的因素中不仅有经济因素，还有政治等非经济因素。恩格斯所作的特别说明和澄清，仅是针对不分场合笼统、过度强调或夸大经济因素决定作用的上述消极色彩的“经济决定论”，它不过是“经济决定论”的一种特定类型而已。恩格斯并没有把批判的矛头指向一切意义上的“经济决定论”，事实上，他也不可能这样做。道理很简单，他和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是异常鲜明地强调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生产力这些经济因素或经济力量在人类历史中“归根到底”意义上的决定作用的。一旦反对一切“经济决定论”，势必把矛头同样指向他和马克思共同创立和阐发的“物质生产决定论”这一唯物史观经典立场，从而动摇唯物史观的理论大厦。

如果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就不难理解，在1890年9月写给布洛赫的同一封信中，恩格斯既要批评德国“青年派”马克思主义者机械搬用“经济决定论”的反辩证法倾向，又要以极为鲜明的态度重申他和马克思共有的那种经典的“经济决定论”立场：“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sup>[7](591)</sup>他还特地指出：“我们自己创造着我们的历史，但是第一，我们是在十分确定的前提和条件下创造的。其中经济的前提和条件归根到底是决定性的。”<sup>[7](592)</sup>恩格斯这里要强调的观点，明眼人一看即知。这里表明的正是他和马克思反复表达过的上述经典的“经济决定论”观点，这是一种明显不同于“青年派”马克思主义者的、真正体现历史辩证法精神的“经济决定论”。

## (二) 马克思、恩格斯均以鲜明的态度强调经济因素“归根到底”的决定作用

我们应注意到，“经济因素归根到底在人类历史进程中起决定性作用”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共同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之后始终坚持的观点，这一核心观点贯穿于他们前后期的经典著作中，绝不是一时确立而后又加以放弃的过渡性观点。这一点毋庸置疑，已成为学界共识。在两位经典作家唯物史观的发展达到最高峰的晚年，上述核心观点并不是仅仅出现在恩格斯1890年写给布洛赫的那封书信中，而是在马克思、恩格斯晚年的诸多重要论著中均有体现。

例如，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这部公认的唯物史观经典著作第一版序言中，恩格斯以与上述书信高度相似的语言郑重表示，“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结底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sup>[8](15)</sup>。在1894年1月写给博尔吉乌斯的信中，恩格斯再次指出：“我们把经济条件看做归根到底制约着历史发展的东西。”<sup>[7](668)</sup>“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都以创造、增加满足人们物质生活需要的物质生活资料为目标，显而易见是一种“经济活动”。正是此类经济活动在人类历史总的进程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是人类历史“归根到底”意义上的决定性因素。

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经济因素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虽然没有直接决定每一个具体事件，但在较长的时间跨度内从根本上决定着社会形态演进的方向，决定着人类社会发展的总趋势与总进程。恩格斯在1894年1月写给博尔吉乌斯的信中，还把经济因素比喻成历史发展的“中轴线”，指出人们“所研究的领域越是远离经济，越是接近于纯粹抽象的意识形态，我们就越是发现它在自己的发展中表现为偶然现象，它的曲线就越是曲折”<sup>[7](669)</sup>，然而如果“画出曲线的中轴线”，就会发现“所考察的时期越长，所考察的范围越广，这个轴线就越是接近经济发展的轴线，就越是同后者平行而进”<sup>[7](669)</sup>。这里充分体现了偶然性与必然性的辩证关系。恩格斯告诉我们，当人们聚焦于某一微观领域或具体事件时，会发现经济因素和上层建筑诸因素存在着复杂的相互作用，偶然性对具体事件有着巨大的影响；但是如果把视角拉长，从总的的趋势和走向上考察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就会发现经济运动总会克服各种偶然性因素的影响，在偶然性中为自己开辟道路，最终从根本上决定社会历史的发展。

与恩格斯一样，马克思始终把物质生产、生产方式、生产力等经济因素视作从根本上区分不同社

会、划分不同社会形态的决定性标志。这在他前后期的多部著作中都有体现。例如，在《哲学的贫困》一书中，马克思指出：“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sup>[9]</sup>“手推磨”与“蒸汽磨”是不同的生产工具，体现着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差异。生产力又是标志着物质生活资料生产发展具体水平的哲学概念。显然，马克思在这里是根据物质生产发展水平的差异把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这两种不同的社会形态区分开来的。在《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中，马克思把物质生活资料生产(特别是“食物生产”)的状况和水平，视作从根本上决定“野蛮时代”与“蒙昧时代”的发展状况和基本面貌的因素<sup>[10]</sup>。马克思把“物质生产”“生产力”“生产方式”这些经济因素视作划分不同社会形态和历史时代的标志，在他看来，经济因素在人类社会中是最能概括、反映不同社会形态、不同历史时代的基本面貌与根本特征的因素。将经济因素视作社会基本面貌的“标志”还意味着，如果社会的经济因素发生了重大、深刻的变化，社会的基本面貌和根本特征也会发生重大变化。社会基本面貌和根本特征随经济因素的变动可能不会立即体现出来，但是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最终会体现出来。这就是说，在马克思看来，经济因素是从根本上决定着社会形态演进和人类社会基本面貌的因素。

诚然，马克思、恩格斯并不否认其他因素(政治的、意识形态的)相对于经济因素具有相对意义上的独立性，并充分注意到它们对经济因素的反作用。但是他们始终强调“归根到底”决定人类历史的正是经济因素，而且只能是经济因素，因为这里有个关键性的限定语“归根到底”。在他们那里，“归根到底”这样的术语仅适用于描述物质经济因素(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生产力)的历史地位、历史作用。非经济因素如政治因素、意识形态等固然对人类社会及历史运动也起着重要的制约作用或推动作用，但它们与经济因素的地位及历史作用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绝不是等量齐观、不分主次的，它们是历史运动中的配角、相对次要的因素，而不是主导者。

此外，还需要说明的是，在马克思、恩格斯历史唯物主义的语境中，“经济的决定作用”具有双重含义，或者说经济的“决定”作用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经济因素(物质生产)“归根到底”决定着人类社会的基本面貌和人类历史总的发展进程；第二个方面是，经济基础“归根到底”对各种上层建筑(包括政治的和思想的上层建筑)起决定作用。由此我们认为，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经济决定论”的具体表现和应有之义是：其一，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及(作为其质和量的直接体现的)生产力“归根到底”决定着人类社会的基本面貌和人类历史总的发展进程；其二，经济基础(即“生产关系的总和”<sup>[11](591)</sup>)从根本上决定政治上层建筑和观念上层建筑。这两个方面都是众所周知的唯物史观经典原理，事实上它们都可以理解为“经济决定论”的特定表现形式、具体形态。关于“经济决定论”的第一种具体含义，笔者在前文中已列出大量(来自马克思、恩格斯经典文献的)文本学证据，相信读者已有所了解。至于第二种具体含义，对马克思主义研究者而言更是广为人知。

马克思在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对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作出经典表述时指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sup>[11](591-592)</sup>经济过程“制约”着其他过程，上层建筑“随着”经济基础变动，这都体现着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马克思在1881年所写的《梅恩〈古代法制史讲演录〉一书摘要》中对“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原理再次进行了论述。马克思批评梅恩这一资产阶级法学家把国家“这一事实”看作“a priori{先验的}存在”，指出“国家的看来是至高无上的独立的存在本身，不过是表面的，所有各种形式的国家都是社会身上的赘瘤……它们最终全都以经济条件为基础。这种条件是国家赖以建立的基础，是它的前提”<sup>[12]</sup>。马克思在上述两个时隔二十多年的文本中表达了相同的观点，表明马克思对“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原理一贯的坚持。

在1886年写成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中，恩格斯指出：“国家、政治制度是从属的东西，而市民社会、经济关系的领域是决定性的因素……在现代历史中，国家的意

志总的说来是由市民社会的不断变化的需要，是由某个阶级的优势地位，归根到底，是由生产力和交换关系的发展决定的。”<sup>[8](306)</sup>在此，恩格斯论述了“生产力和交换关系”即经济基础归根到底对“国家、政治制度”的决定作用。对于经济基础如何决定观念上层建筑，恩格斯以宗教为例指出：“宗教一旦形成，总要包含某些传统的材料……这些材料所发生的变化是由造成这种变化的人们的阶级关系即经济关系引起的。”<sup>[8](312)</sup>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同样论述了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两个领域的决定作用。恩格斯以“暴力”这一政治因素与经济状况的关系说明了经济基础对政治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暴力还是由经济状况来决定的，经济状况给暴力提供配备和保持暴力工具的手段”<sup>[13](174)</sup>。恩格斯还论述了经济因素归根到底对伦理观念的决定作用：“人们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归根到底总是从他们阶级地位所依据的实际关系中——从他们进行生产和交换的经济关系中，获得自己的伦理观念。”<sup>[13](99)</sup>对于道德，恩格斯指出：“我们断定，一切以往的道德论归根到底都是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sup>[13](99)</sup>

很明显，“经济决定论”中的两个关键词分别是“经济”与“决定”，而无论是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生产力，还是“生产关系的总和”，都是“经济因素”的具体类型，因此，说“经济起决定作用”完全符合马克思、恩格斯历史唯物主义的语境和立场。如果说马克思、恩格斯强调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生产力对人类社会基本面貌、人类历史基本进程、历史总的走向“归根到底”的决定作用，以及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归根到底”的决定作用不构成“经济决定论”，甚至连特定意义上的“经济决定论”都谈不上，那么这是匪夷所思、令人无法理解的。如果这两个方面都不足以使我们认定其为“经济决定论”，那么试问：还有何种思想倾向可用“经济决定论”来形容呢？难道只有那种以违反辩证法的方式单纯地、过度地强调经济因素的“决定”作用的思维倾向可用“经济决定论”来形容？在我们看来，即便存在其他意义上的“经济决定论”，马克思、恩格斯上述的经典决定论立场完全可以用“经济决定论”一词来概括。试问，“经济决定论”难道不是对马克思、恩格斯上述经典立场的某种确切描述吗？

当然，这里还有必要对马克思、恩格斯的“经济决定论”进行阐释和说明，以避免人们将其与机械论色彩的“经济决定论”混为一谈。符合历史唯物主义本意的“经济决定论”并不认为经济因素随时随地、不分具体领域和场合直接决定着人类社会的每一微观领域和每一具体事件，而是强调：物质生产、经济因素作为一种根本性的因素或力量，在“归根到底”的意义上，最终决定着人类社会的整体面貌和人类历史的总体进程<sup>[14]</sup>。马克思、恩格斯的“经济决定论”在强调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时，也强调这种决定首先是“归根到底”意义上的，并不认为上层建筑的具体特点、具体面貌都是由经济基础一劳永逸地、一成不变地予以规定的，不认为上层建筑的所有细节、所有特点都能直截了当地在经济基础那里找到直接的原因。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特别是宗教、哲学等观念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往往不是直接的，而是间接的，即通过中间环节来体现的。马克思、恩格斯“经济决定论”中对“经济决定作用”的上述理解，有力地表明和彰显了他们的“经济决定论”的辩证色彩和科学精神，是对机械论色彩的“经济决定论”的根本超越。

#### 四、结语

综合前文的分析可知，“经济决定论”有不同的类型，不可一概而论。将“经济决定论”直接等同于机械决定论色彩的那种“经济决定论”是不妥的。此种消极意义上的“经济决定论”不过是广义的“经济决定论”的某种特定类型、特定形式而已，不能认为凡是“经济决定论”都必定是此种类型的“经济决定论”。“经济决定论”本身是一种中性、广义的提法，不必然是消极提法和消极术语，对

此不应有疑问。而对马克思主义的一切研究者来说，尤其值得重视的是，历史唯物主义就其基本立场而言，必然包含、必然体现某种意义上的“经济决定论”，尽管只是特定意义上的“经济决定论”。这就是：经济因素归根到底决定人类社会的基本面貌和人类历史的总体进程；经济基础归根到底决定上层建筑。如若不承认这一点，势必离开历史唯物主义的经典立场、基本观点，曲解其思维方式，使得历史唯物主义的经典立场和基本见解无从体现，并陷入不能自圆其说的境地。既然人们高度认同历史唯物主义上述两个方面的经典观点（经济因素归根到底决定人类社会的基本面貌和人类历史的总体进程；经济基础归根到底决定上层建筑），那么相应地，就应该充分注意到：这里所突出和强调的，不是别的，正是经济因素以某种鲜明的方式彰显出来的“决定”作用。我们完全应该把这两方面的“决定”作用描述为特定意义上的“经济决定论”。肯定此种“经济决定论”并不意味着背离历史唯物主义的经典立场和思维方式，而恰恰意味着对这种立场和思维方式的捍卫与维护。

### 注释：

- ① 拉法格说：“生产直接或间接地把广大量的人的精力吸引过去；只有微不足道的少数在社会环境的其他部分，即政治、宗教、文学等等里面工作。但是这个少数为了取得物质的和精神的生产资料，不得不也关心生产。其结果是一切人都在或大或小的程度上受着生产方式对他们的肉体的和精神的生活的影响，只有最少数的人仅仅服从于环境的其他部分的影响。”参见拉法格：《思想起源论：卡尔·马克思的经济决定论》，王子野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35—36页。
- ② 在《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书中，伯恩施坦认为所有唯物主义者在解释历史时都要回答“什么力量要素或者哪些力量因素在其中起决定作用”的问题。伯恩施坦注意到，在这个问题上，马克思“把各个时期的物质生产力和人的生产关系称为决定性因素”（伯恩施坦：《伯恩施坦文选》，殷叙彝编，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41—142页）。在以“社会民主党内的修正主义”为题的某次演讲中，他再次把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思想概述为：“人类在发展过程中依旧受到自己的生存条件的制约。换句话说：归根到底，经济即生活资料生产的方式方法……和生活资料生产的自然条件构成人类社会变化的历史中的最终决定性的因素。”（同上书，第415页）
- ③ 两处文本学证据可以说明伯恩施坦的上述观点。第一处文本学证据是伯恩施坦针对恩格斯晚年书信所作的评价：“如果从恩格斯在给康拉德·施密特的信和在《社会主义大学生》发表的信中赋予历史唯物主义的那一成熟形式向后追溯到最初的一些定义，并且以此为根据而对它作‘一元论’的解释，这会是极大的退步。”（伯恩施坦：《伯恩施坦文选》，第148页）“最初的定义”就是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和《资本论》“第一卷序言”中有关“经济起决定作用”的论述。伯恩施坦认为根据这些论述对人类历史进程作“一元论”解释是一种“退步”，言下之意是认为恩格斯在晚年书信中不再像马克思那样坚持对人类历史发展作“一元论”解释（这是对恩格斯原意的严重误读，下文将进行澄清）。在伯恩施坦看来，放弃对人类历史的“一元决定论”会构成某种“进步”。伯恩施坦放弃对人类历史发展作“一元决定论”解释，实质上就是放弃经济因素“归根到底”起决定作用的观点，就是认为经济因素和思想意识等非经济因素都可以作为“独立的”力量对历史进程产生“决定性的”影响，经济因素和非经济因素对人类历史的决定作用并没有质的差别，有的只是量的差别。第二处文本学证据是伯恩施坦在意识到强调非经济因素的作用与影响势必遇到其与经济因素的关系问题时所作的回应：“如果继续按上述方式通过插入其他力量而扩大唯物主义历史观，那么它到什么程度为止还能有权利叫这个名字。事实上按照前引的恩格斯的说明，它并不是纯粹唯物主义的，更谈不到是纯粹经济的了。”（伯恩施坦：《伯恩施坦文选》，第150页）历史唯物主义之为“唯物主义”的一个重要体现，就在于其坚持“经济‘归根到底’起决定作用”的观点。伯恩施坦由于强调思想意识等非经济因素的作用与影响，不再把历史唯物主义视作“纯粹唯物主义的”，表明他混淆了经济因素与非经济因素在人类历史进程中的关键性差别，陷入了“二元论”或“多元论”。伯恩施坦在有意地削弱了“经济决定论”后，试图对自己的观点进行某种缓和与修饰，即对经济因素的作用做出某种承认：“我决不想对巴尔特所用的‘经济史观’这一名称感到愤怒，而是不管怎样要把它看成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的最恰当的名称。这一理论的意义在于它对经济的重视，它对历史科学的巨大贡献来自它对于经济事实的认识和评价，人类知识的这一部分由它得到的丰富也是来源于此。所谓经济史观并不一定说是，只承认经济力量和经济动机，而只是说，经济形成了不断起决定作用的力量，形成了历史上伟大运动的支点……哲学的或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是严格的决定论的，但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并不认为各民族生活的经济基础对各民族生活的形态具有无条件的决定性影响。”（伯恩施坦：《伯恩施坦文选》，第150页）然而即使在这里，经济因素的作用也只是被概括为“不断起决定作用”或“伟大运动的支点”，这种作用方式与非经济因素并没有实质不同。经济因素“归根到底”的决定作用仍然未被彻底地承认。

## 参考文献：

-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0.
- [2] 拉法格. 思想起源论：卡尔·马克思的经济决定论[M]. 王子野，译.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3.
- [3] 伯恩施坦. 伯恩施坦文选[M]. 殷叙彝，编.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148.
- [4] 曼昆. 经济学原理：微观经济学分册[M]. 7版. 梁小民，梁砾，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
- [5] 马歇尔. 经济学原理[M]. 朱志泰，陈良璧，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 15.
- [6] 牛先锋.“经济决定论”的谬误与“历史合力论”对其的批判[J]. 马克思主义研究, 2020(9): 136–145, 160.
- [7]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8]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9]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602.
- [10] 林锋.“两种生产依次决定论”的学理批判[J]. 马克思主义研究, 2020(9): 62–70.
- [1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1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645–647.
- [1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14] 林锋.“人类学笔记”与历史唯物主义及《资本论》的关系[J].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2018(5): 60–66.

## A critical examina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nd “Economic Determinism”

LIN Feng, YAN Tian

(School of Marxism,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Abstract:** The prevailing academic view considers “Economic Determinism” as a mode of thought fundamentally opposed to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nd rejects its application in describing the theoretical stance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However, through repeated identification and elaboration of relevant statements in Marx and Engels’ classic texts, it can be found that they have never simply opposed their Historical Materialism theory to “Economic Determinism”, nor have they opposed or rejected “Economic Determinism” in the sense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In fact, what they oppose is merely the simple, excessive, and one-sided emphasis on the decisive role of economic factors, which is a kind of “Economic Determinism” that violates historical dialectics and has a mechanistic flavor, regardless of the situation and field. Many of Marx and Engels’s statements fully demonstrate that they are “Economic Determinists” in a specific sense. The Historical Materialism co-founded by Marx and Engels emphasizes that economic factors determine the basic features of human society and the overall course of human history, and that the economic foundation determines the political and ideological superstructure. This can be classified as a form of “Economic Determinism” in a sense. Significantly, stripping the “decisive role of the economy” from Historical Materialism or refusing to give it the title of “Economic Determinism” means a misunderstanding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nd will cause that the core position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unable to be reflected, thus making Historical Materialism not “Historical Materialism”. Clarifying the true relationship between “Economic Determinism” and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s well as regaining the due place of “Economic Determinism” in the Historical Materialism helps to deeply understand the core ideas and fundamental positions of the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nd highlights the theoretical characteristics, theoretical character, and proper way of thinking of Marxist philosophy.

**Key words:** Marx; Engels; “Economic Determinism”; “Historical Materialism”

[编辑：胡兴华]